

战后台湾经济

第二册

(上)

2

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战后台湾经济

(译文集)

第二册

(上)

《台湾资料丛刊》之四

厦门大学台湾研

一九八二年四月

战 后 台 湾 经 济

(译文集)

第 二 册

(下)

《台湾资料丛刊》之四

厦 门 大 学 台 湾 研 究 所

一 九 八 二 年 四 月

目 录

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概况	拉蒙·H·迈尔斯 (1)
台湾忍痛以求争胜	安东尼·罗利 (38)
台湾外国投资下降	美国《商业新闻》 (47)
台湾进行发展高级技术的实验	斯特凡·哈格 (49)
台湾和南朝鲜采取高速发展经济的道路	英国《经济学家》 (54)
台湾农业能取得进一步发展吗?	《中国邮报》 (63)
在台湾经济繁荣时期中农业的困境	亨利·卡姆 (65)
一九八〇年台湾农户平均年收入额达新台币 207,300 元	《中国邮报》 (68)
台湾十年经济建设计划	日本台湾研究所《台湾总览》(1981年) (70)
台湾的对外贸易制度	日本台湾研究所《台湾总览》(1981年) (165)
台湾对投资的优惠待遇	许金德 (187)
台湾的财政	日本台湾研究所《台湾总览》(1981年) (191)

战后台湾经济

第二册

(下)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概况

拉蒙·H·迈尔斯

以下三个有利条件使台湾战后的经济增长得以列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国家之一^①：（一）台湾经历过五十年日本开明的殖民统治，这种开明的殖民统治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所接受的台湾拥有一个已经相当发达的农业部门和相当发达的公路网、铁路网、市场体制和公共卫生设施。（二）五十年代美国的援助有力地帮助了中国国民党控制了物价上涨和忍受了相当长时期的贸易逆差（这段期间正是台湾建立新工业的时期，并有力地帮助了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三）在五十年代鼓励发展代替进口工业之后，台湾政府在六十年代初期转变它的发展代替进口工业的政策，并采取发展面向世界市场的现代工业部门的措施。

战后台湾的经济发展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的经济结构开始逐步从一个依赖于农业的经济结构转向一个依赖于工业的经济结构。战后，这种转变的趋势加速了，因此到了1977年时，农业部门在商品与劳务总产值中只占13.4%，1952年此项比重为35%，而制造工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在1977年占38.8%，1952年占18%。服务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在1977年稍降至47.8%，但它

① 台湾是我国的一个省份，不是一个国家，下同——译者。

在1976年却雇佣了41%的劳动力，1952年只雇佣了30%的劳动力。由于台湾在五十年代的人口增长率高达3.5%，而且平均人口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很高，五十年代期间为3%，六十年代期间为7%，因此台湾经济结构的上述转变便显得十分突出。

尽管台湾在战后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经济脱节和物价上涨，但到了1952年，国民党政府便已控制住了物价上涨并使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台湾政府利用了美国根据公共法第480条所提供的粮食援助稳定了粮价，采取了土地改革以减轻地租并把土地分配给小农，并大量投资扩建公共交通运输、河流控制等社会基础设施和发展业生产技术研究。1952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四年经济发展计划有利于发展代替进口工业；但1958年以后，台湾政府的经济政策便转向于放松贸易管制并鼓励迅速发展出口工业。

在1960年到1973年期间，台湾经历了一段经济空前繁荣时期，出口值增长了20倍，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按1966年价格计算）增加了两倍多。1978年的平均人口收入额（按1978年价格计算）约达1304美元，而1960年的平均人口收入额却只有395美元。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台湾经济的如此显著增长，其原因是由于技术的进步（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产值增长占1963—72年期间产值增长额的一半）和资本积累（占36%的产值增长），其余的14%的产值增长是劳动量的增加。

以下这样一个事实是很有意见的：1967年以前外来资金对台湾资本形成净增加额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在1967年以后，国内储蓄几乎提供了资本形成净增加额的全部资金来源。六十年代末期，资本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从以建筑业

资产为主转向以交通运输设备、机器设备为主。对外贸易的扩大是台湾资本形成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出口贸易额增长的80%是来自台湾的食品、原料、机器设备和其他制造工业品的出口价格和质量在世界市场具有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的来源在于成本低、劳动技术熟练、企业经营管理高效率、商人的高度赢利积极性，台湾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当然迅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新的问题。1965年以后，农业劳动力趋向短缺了，农业工人工资突然上涨，提高了农业成本和农产品价格。七十年代初期，公共交通运输和主要港口船运的拥挤首先反映了需求量已经过了台湾社会基础设施所能提供的服务能力。1973年能源危机和进口价格的上涨威胁到台湾在世界市场竞争能力。从1973年9月到1974年初，台湾国内商品价格迅速上涨。台湾中央银行采取提高再贴现率和提高银行存款利息率的办法来加紧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这些措施促使货币需求量的下降和鼓励增加储蓄。到了1974年底，物价开始有阶稳定。接着，政府在1975年适当地减轻了税收以免使许多重要工业陷入衰退。

台湾经济的储蓄能力是相当强大的，1962年，国内储蓄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但到了1977年已经提高到了占30%，超过了美国的储蓄率（占16%）、德意志联邦共和国（21%）、英国（18%）和加拿大（23%）。收入分配也逐步趋于比较公平，目前台湾收入分配的均衡度已经和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相近似了。1950年，20%的最富裕阶层家庭收入为20%的最贫困阶层家庭收入的十五倍。1977年，它们之间的差距已降到4.2倍；日本的此项差距为4.1倍，南朝鲜为7.9倍；1972年美国的此项差距为9.3倍。

资 源

1969年林地占 2,319,000 公顷，约占台湾土地面积的二分之一。台湾的林木有：阔叶树、针叶树、灌木和竹。耕地只占土地面积的24%。人口的迅速增长使耕地面积从1910年的1,665,000公顷扩大到 1940年的2,124,000公顷和1965年的2197220 公顷（已接近于最大的限度）。台湾的耕地土壤大部分是冲积土壤，这种冲积土壤的肥力相当高，相当适于农作物生长。

矿产资源贫瘠，看来也不会再发现有什么重要的矿藏。主要矿产有煤、黄金、硫黄；其他矿藏则有铜、石油和盐。在台湾北部地区的页岩和沙岩中发现有油页岩。按目前的采煤率（七十年代末期，每年约采煤 300 万吨），现有的煤蕴藏量预计可维持五十年弱。

[人力]

1979年3月，台湾人口有17210918人，1952年为8128374。在今后的二十五年内，人口可能增加一倍。1978年的人口粗出生率为2.41%，预计将会逐步下降。

从1965年10月到1976年10月期间，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增加了一倍，达 4,181,000 人，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却从1969年的高峰（170万人）开始下降，1970年降至160万人。198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农业部门劳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每年新增加的农村劳动力减少了。这些青年流往城市和市镇就业和上学。因此，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已经从1967年的34岁提高到1977年的39岁，而且估计还会进一步提高，1982年估计将达42岁。

制造业、建筑业、商业以及诸如政府部门、事务所和商店等服务业的就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很快。在1970年以前，0—15岁年龄组中的人口增加得很慢，这种人口发展趋势说明经济必须迅速发展以便吸收15岁以上的进入就业年龄组的人口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更多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青年要求从事于专门职业和文职工作，这样一来，台湾将立即面临知识分子无法充分就业的严重问题，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农 业

1965年以前，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最大的比重，其后，此项比重便不断下降，因为工业生产迅速增长而农业生产的增长率却有所缓慢。原来用来种粮食作物的土地改为用来生产更多的蔬菜、蘑菇和水菓。更多的农业资本和劳动力也转向于用来提供家禽和猪。但由于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劳动力减少，复种指数也稍下降，加紧使用了部分农业机械化，这种代价较高的农业专业化趋势只能意味着粮食作物生产可能难以满足今后需求量的增长，需要进口粮食或提高粮食价格。有85%以上的农民只拥有3公顷以下的农地，其中有45%只拥有1公顷以下的农地。1977年，平均一户农户的人口有6.4人，农户总数有872,509户，耕种922,778公顷农地。

〔作物〕

按耕种面积来排列，台湾的主要农作物依序为：大米、糖蔗、甘薯、和落花生。大米占农业产值的一半以上，并接近占农业耕地的一半。上述这几种主要农作物的耕地面积自

从1969年以来便已在不断缩小，因为农民已经把耕地用来改种玉米和大豆，作为饲养猪和家禽。城市近郊的农地则改为种蔬菜和水菓。1978年台湾的猪肉产量为579,327吨，1964年为224,000吨；同期，鸡蛋的产量增加了三倍。

[农作物产量的提高]

1910年以前，农业产值的增长是由于生产投入量（如土地，劳力和农民自己制造的农业设备）的增加。在1910年到1970年期间，农业产值的扩大速度比过去高两倍，并且新的农业设备和农业技术开始在产值增长值中占了一半左右。农业生产率的这种提高乃是由于开展了广泛的、有效的农业服务活动，其中包括了向农民提供农业生产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帮助。1893年在台北设立了台湾的第一个农业研究站；到了1908年在五个主要行政区都设立有同样的农业技术研究站，到了1908年，在五个主要行政区都设立有同样的农业技术研究站，这些研究站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以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和医治牲畜。区农业技术研究站为农业协会服务，农业协会从区协会领取新品种并由区协会教授使用方法，然后农业协会把这种品种介绍给各个农村。1938年以前，大米和糖蔗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采用了新品种。目前，这种农业研究和农业技术普及制度仍在进行活动，这种体制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成绩曾经使台湾农民成为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最有农业生产知识和最有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

除了采用新品种之外，台湾在发展水利灌溉设施和使用化肥、杀虫剂、新农业机械方面都取得相当显著的进展。由

于在二十年代开始构建的几个大型水库和许多运河分渠系统、池塘已经完成，因此三十年代台湾农田灌溉面积有了很大的扩大。到了1955年，已经有五分之三的农田受到水利灌溉。1940年以前，农民使用粪便和豆饼作为农田肥料而很少使用化肥。1965年以前，农民已经改用磷化合物和硫酸盐化合物作肥料以代替氮肥化合物，而且前台湾的化肥工业已经能够为农民供应足够的氮肥。台湾农村已经广泛使用杀虫剂，在台湾的许多农村都可以找到碾米机、旋转耕耘机、动力喷雾器、杀虫剂喷洒机、抽水机和气象探测器。但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农户有自己的农业机械，因此进一步提高农业产量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当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农业机械时，农业产量将可以有进一步的增长。

[土地租佃制度]

战后台湾农村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创造了自由农民阶层和消除了不在乡地主阶级，这是由于1949年到1953年进行了一项土地改革计划后实现的。通过向地主支付一笔合理的地价并鼓励他们在城市工业投资的办法，台湾政府诱导地主阶级把他们的财富和潜力从农业转向金融业和工业。通过设立一家土地银行并按比较优惠的条件向佃农提供贷款，台湾政府使十户农户中有八户拥有自己的农地，战前十户农户中只有三户有自己的农地。在1956年到1970年期间，尽管农业人口从4,488,763人增加到5,996,889人，但1970年以后，农业人口开始下降，到了1977年降低到5,572,130人。1976年，佃农和半自耕农农户的比重各为9%，1955年佃农比重占19%，半自耕农比重占58%。

工 业

台湾虽然缺乏燃料和矿产资源，但这并没能阻碍台湾发展新工业。在1945年到1952年期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台湾所建立的工业核心逐步有所恢复了。台湾政府所实施的进口贸易管制和外汇准字制度使进口中间性商品的进口商有利润可赚。出口贸易额下降，进口贸易额上增，战前工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由于这种保护国内弱小工业的贸易制度和外外汇管理制度的作用，台湾的两种新工业部门（纺织工业和化学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但到了1954年，工业生产的增长开始缓慢下来了，制造厂商发现他们的商品积压起来了，生产设备闲置能力增加了，而纺织工业和化学工业所受的打击特别严重。1958年，台湾修订了它的原有政策，放宽对外贸易的管制，使贸易自由化。撤销了对许多商品的进口限制，许多工业企业受到鼓励发展为世界市场生产，政府降低它们所需要进口的产品的成本。制造工业部门再度加速发展了，在1961年到1973年期间，整个制造工业部门的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7%；由于台湾在1973年和1974年初采取措施抑制物价上涨，1974年到1975年期间，制造工业部门产值增长速度下降了。1975年，台湾政府开始为一些公司和工业企业提供减税，以鼓励一些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争取保持其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看来取得了成效，在1976年到1977年期间，工业产值增长了11.2%。

自1960年以来，台湾的工业结构有了相当大的改变，1960年，轻工业在工业部门净产值中占了60%，其他工业部

门（包括化学工业、机器工业、金属工业、建筑业等）占40%。但到了1977年，轻工业部门的比重已下降到48%。1976年矿业产品和制造工业产品的相对值比重为：食品与饮料（在工业净产值总额中占10%）、纺织品（占15%）、化学品（占16%）、石油产品（占10%），其他（占49%）、绝大部分基础工业分布在高雄市。轻工业分布在台北附近，以便利用基隆港口进口原料（如进口棉花供应附近的纺织厂）。依靠国内农产品（如糖蔗）作为原料的工业集中在南部地区。食品加工工业（如碾米、谷物碾磨、食用油制造、豆腐制造、调味品）则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市镇。

纺织、塑料、胶合板、机械制作和电气器材工业的投资商取得了相当大量的利润并成功地打进了国际市场。这些工业部门充分地利用了台湾的有利条件（低廉的劳动力、容易取得的原料），并发展繁荣起来，因为它们保持了低生产成本。而另一些工业部门（如汽车工业、钢铁工业，炼铅工业）则没有什么发展，因为它们的产品生产成本低而质量低劣。

1965年，台湾政府指定高雄作为设立工业区的地点，按香港那种自由贸易经济的模式鼓励投资商和实业家在这里发展出口工业。划定了165英亩土地面积供投资商设立工厂，生产光学设备、塑料、电气器材、化学品、服装、家具、出口用包装材料。到了1973年年底，另两个工业区（楠梓和台中）也投用了，目前正在计划设立第四个工业区。1977年底在这些工业区已有267家工厂投产。他们的总投资额达2.29亿美元，雇用了71,000名工人，1977年的出口商品总值达7.61亿美元。

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外国资本开始大量倾入台湾投资。日本企业家和美国企业家在台湾设立工厂装配工业产品出口到日本市场和美国市场。台湾进口商开始寻找日本以外的进口来源以买进机器设备和中间性产品。同时，台湾政府的措施是准备加强现有的有限股份公司、增加对工业企业的贷款，调整公司税和放宽贸易管制以期鼓励提供企业经营效率。

外国援助和外国投资

众所周知，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台湾的经济恢复将会拖延下去，而且它的经济将会在物价上涨的潮流中挣扎，经济将会陷于停滞。国民党政府把经济援助用于发展农业和工业。在1951年到1965年期间，台湾接受了14.65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些经济援助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可以从1952年到1960年期间台湾资本形成的资金来源看出来，美国援助为这段期间的资本形成提供了26%的资金，并使台湾每年的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约1亿美元，美国经济援助还被用于建设化肥工业，建设石门水坝（Shihmen dam），开展许多农业建设项目，建立学校和培训师资。1965年，美国经济援助计划终结，到了1979年所有美国的经济援助均已使用。

1977年侨资和外资在台湾的投资总额达1.639亿美元，比1976年增加了15.8%。五十家公司的外资投资占了这部分投资总额的60%。电子工业和电气器材工业的外资、侨资投资比重最高，占32.2%，其次为服务行业占31.3%，化学工业

部门占8.6%。在外资投资中，日本和美国的投资居首位。二十家日本公司投资了2410万美元，而十七家美国公司投了2420万美元。

国 外 贸 易

台湾大幅度依靠国外贸易以进口原料和机器设备来发展工业，并进口台湾目前仍无法生产的消费品。战前，糖和小米占台湾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三。食品和纤维占进口总额的五分之二，其余的进口商品包括了纺织品和杂项商品。战后时期的工业发展大大增加了对原料、半制品和机器设备的需求量。食品和纤维的进口比重目前占不到四分之一。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五十年代期间，工业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平均占不到21%。但到了1965年，它们已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农业原料及其加工产品在1977年只占出口总额的12.5%，而工业产品却占出口总额的87.5%。

1964年，台湾第一次有了出口顺差1600万美元，但接下去连续六年都有不太大的逆差额；接着在1971年到1973年期间，有了巨额的出口顺差，1974年有巨额逆差13.27亿美元（原因是原油价格突然猛涨），1975年贸易收支逆差额降至6.20亿美元，1975年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来抑制物价上涨。

1979年对美国的出口比重占39.5%，其次依序为：日本（占12.4%）、香港（占6.8%）。在台湾的进口供应中，日本占33%，其次为美国（占21.6%）和科威特（占7.2%）。台湾出口大量的水泥，化肥和纺织品到东南亚地区。

由于1972年底前后，进口价格迅速上涨，台湾政府在十类进口商品降低了进口关税；1973年3月，台湾政府又撤销了2,360项商品的进口管制，这样一来，除了军火商品、海洛因和贵金属（如黄金）之外，对一般商品的贸易限制已经全部撤除。1973年2月，台湾政府进行台币（新台币，元）贬值，官方汇率从1961年以来，一直是1美元=40元新台币，调整为1美元=39元新台币，此一汇率一直实行到1978年7月；1978年7月台湾又进行了一次台币贬值，新汇率为1美元=36元新台币。

由于新台币是和美元挂钩的，最近美元的贬值也影响到台币，特别是和日元的比值。1978年12月，台湾立法院批准台湾中央银行在台币对美元的汇率方面实行“浮动”。根据新的外汇管理体制，外汇收入商可以用特别存款帐户（银行存折或定期存款）保存外汇。中央银行不再收买和出售外汇，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动可以自由决定新台币元对美元的汇率。中央银行只是在供需关系发生剧烈变动时进行调节而已。

财 政 与 金 融

台湾银行行使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责，发行钞票、管理外汇，并对其他银行放款。1961年，中央银行在停业十一年之后在台北恢复营业；它也可以向其他银行放款、负责管理美国援助基金，并为政府贸易提供资助。

台湾银行和各个国家银行在物价突然上涨时负责严格管制货币供应。六十年代期间，台湾银行和各个国家银行容许